



圖1 清 康熙至雍正 紫砂扁圓腹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《清心妙契—故宮珍藏茶文物精品集》下卷，澳門：澳門藝術博物館，2013，圖106。



圖2 清 康熙 紫砂貼花鳳凰紋扁圓腹壺 Oosterland號 引自註3，fig. 5.



圖3 清 雍正至乾隆 紫砂扁圓腹壺 藍國威墓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黃健亮特聘研究員提供

清宮傳世雍正朝紫砂器再識

王亮鈞

「北京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北京故宮）皮藏一批以往被視為雍正朝的紫砂器，其造型簡練，胎色古樸。然而，藉由與經正式考古發掘沉船船貨、墓葬遺物，乃至傳世實物比對，部分所謂的雍正朝紫砂器，年代或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。透過本文幾件個案爬梳，使我們認識到，清宮傳世無款紫砂器的準確定年極為不易。」（註一）

關於清宮傳世的紫砂器研究，學界較偏重康熙（一六六二—一七二二）、乾隆（一七三六—一七九五）朝製品的考察，其主因為作品大多留有年號、琺瑯彩、御製詩等可供辨別年代線索，免除斷代疑慮。近年，王健華從清宮傳世無款紫砂器中，比對雍正朝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以下簡稱《活計檔》）所載品名，佐以同時期造型可資對應官窯瓷器，以及吻合雍正皇帝審美品味者，梳理該一時期作品樣貌，填補以往未見雍正朝紫砂器的空白。（註二）二〇〇八年《故宮博物院藏

文物珍品大系—紫砂器》，進一步全面性地公開被視為雍正朝的紫砂器。就此而言，學者以清宮檔案、流行器式與帝王品味，來掌握雍正朝紫砂器樣貌，應予高度重視。不過，部分作品的附會、對比，或仍有待商榷。本文擬針對北京故宮藏清宮傳世所謂的雍正朝紫砂器，比對部分已知相對年代沉船、考古遺址標本，做些必要補充，附帶討論相關問題。

關於幾件紫砂器的年代

如果依照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—紫砂器》分類，訂定為雍正朝製品中，以壺的數量最多（八件），其次為茶葉罐（六件）、筆筒（二件）、鉢（二件）、花盆（二件）、硯滴（二件）、盒（二件）、碟（一件）。其中，紫砂壺造型各異，土胎不一而足，大多全器光素無其他裝飾。比如說，《紫砂扁圓腹壺》（圖一），造型呈短直頸、圓弧肩，最大徑約在器正中，以下弧度內收。壺蓋與壺口壓蓋彌合，蓋上置圓鈕，壺鈕中央略尖。流作二彎，壺嘴至根部漸粗。從圖片看來製品燒結良好，

通高七·五公分。以往學者因其簡練造型、古穆胎色，推測屬雍正朝製品。

時代風格雖是判斷作品年代相關依據，卻可能無法提供有效定年方案。儘管《紫砂扁圓腹壺》形制、土胎，頗符合雍正皇帝所謂的文雅精妙審美觀，但由於明代中期以迄近代紫砂壺，均存在大量這類光素古樸之作，故無法僅此判別可能的所屬年

代。事實上，南非好望角打撈一六九七年沉沒荷蘭籍 Oosterland 號《紫砂貼花鳳凰紋扁圓腹壺》（圖二）（註三），即與清宮傳世所見造型接近。撇除壺流與口沿造型，兩者肩以下內弧收縮弧度、壺把形制，以及壺頸與圈足等寬、等高特徵，皆頗為相像。

一九九〇年七月遭盜掘福建省漳浦縣

赤嶺畬族鄉南坑村藍國威墓，出土帶有「丙午仲夏，鳴遠仿古」款《紫砂扁圓腹壺》（圖三），為迄今唯一出於紀年墓葬、留有陶工陳鳴遠款珍貴作品。墓主藍國威（？—一七五六），字少儀，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二）貢生，歿於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）。藍國威墓壺胎呈栗紅，表面滿布梨皮狀顆粒。王文徑據同墓伴出雍



圖6 清 雍正至乾隆 紫砂扁圓腹壺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提供

肩：前者直頸與壺身銜接自然，後者較為分明，肩部相對圓聳。可以想像，陶工處理前者壺頸與壺身相接處，逐步填泥修整，使線條連貫流暢。另外，前者壺流、壺把略微纖細，搭配其鈕頸較長特點，整體造型更顯挺拔細膩，與後者呈現渾厚蘊蓄不同。綜合以上比對，筆者傾向清宮傳世〈紫砂扁圓腹壺〉形制較似Oosterland號船貨，而與藍國威墓所見有差距。果若如此，清宮傳世〈紫砂扁圓腹壺〉製作年代，或能上溯康熙時期，但仍須日後進一步比對。

〈紫砂平蓋碩腹壺〉（圖七），泥胎



圖7 清 18~19世紀 紫砂平蓋碩腹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—紫砂器》，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等，2008，圖8。

暗紫，唇口、身筒如鉢，肩以下內弧收縮。一彎壺流自壺腹向上延伸，與壺口相切。Michael Hatcher 近年發現以往稱為「的惺號」（Tek Sing）沉船，船貨所見紫砂壺樣式頗為豐富，其中〈紫砂碩腹壺〉（圖八）乍看之下，與清宮傳世所見近似，不過前者短直頸、二層台式平蓋、耳形把特徵，仍與後者有所差異。

依據英國東印度公司（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）文書記載，可知「的惺號」於道光二年（一八二二）一月自中國廈門出港，原擬航向巴達維亞，卻於同



圖8 清 19世紀 紫砂碩腹壺 Teek Seeun號 引自Nagel Auctions: Tek Sing Treasures, Germany: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, 2000, p. 275.

年二月五日沉沒於蘇門達臘島海域。不過，據陳國棟的考訂，「的惺號」船名應為「Tek Seun」，中文名或為「得順」、「德順」，而絕非「的惺」。另外，其提示該船搭載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人，撇除所需伙食及個人隨身物品，應無法裝載如二〇〇〇年於德國斯圖加特（Stuttgart）拍賣如此大量瓷器船貨，推測或混雜同一地點、海域多次沉船之物。（註六）除了陳國棟指出「的惺號」為數不少小童瓷偶，可能並非源自同一艘船，筆者發現該船〈青花水波龍紋盤〉（圖九），似有相類情況。因其造型

正時期白釉墨彩茶盤、「若深珍藏」款〈青花杯〉（圖四），推測該壺亦為前朝舊物，「丙午仲夏」即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）。（註



圖4 清 雍正 青花杯 藍國威墓 引自《荆溪朱泥—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》，臺北：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，2010，頁53。

四）於此想補充的是，數年前於越南金甌省沿海發現相對年代約於雍正時期的金甌沉船，打撈品見口沿明顯外折，以下斜直內收，外底心書「若深珍藏」雙豎行款的〈青花杯〉（圖五），從標本款識書跡、整體形制與藍國威墓所見類同來看，筆者同意學者將後者年代定為雍正時期的看法。不過，紫砂壺常見托古紀年款，因此藍國威墓壺年代下限，保守估計或為十八世紀中期。

其實，黃健亮已據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「江上清風，山中明月」款〈紫砂扁圓腹壺〉（圖六），復原藍國威墓壺原來器形。（註五）藍國威墓壺呈直頸、環把以及壺口與圈足相若特徵，頗易使人與清宮傳世〈紫砂扁圓腹壺〉產生聯想。若仔細觀察，兩者整體造型仍有差異。壺鈕：前者形似壺身，中央略尖，後者呈扁平狀；壺蓋：前者蓋面微鼓，後者相對平緩；壺



圖5 清 雍正 青花杯 金甌沉船 引自《海上絲綢之路遺珍：越南出水陶瓷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9，圖90。



圖16 清 康熙 紫砂貼花牡丹紋象耳提梁壺 德國安東烏爾里希公爵博物館藏 引自Ostasiatika, Braunschweig, 2002, pl. 37.



圖15 清 康熙 紫砂象耳提梁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《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9，圖30。



圖13 清 乾隆 紫砂泥繪蘆雁圖茶葉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—紫砂器》，圖99。



圖14 清 乾隆 紫砂泥繪蘆雁圖六方茶葉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—紫砂器》，圖106。

(一七五二)~(一七五八)之間。(註八)在此想補充的是，從刻有乾隆皇帝御製詩〈紫砂泥繪蘆雁圖六方茶葉罐〉(圖十四)來看，因其紋飾、構圖及泥繪技法，與「六安」、「珠蘭」款茶葉罐等相像，筆者同意後者製作年代，亦為乾隆時期。

順帶一提，以往北京故宮收入圖錄定為乾隆時期〈紫砂象耳提梁壺〉(圖十五)，其造型源自青銅甬，口沿斜削一周做出稜面，細孤頸、溜肩、圓鼓腹，下置外撇高圈足。提梁與壺身銜接處以象耳為飾，於壺腹最大徑處安置三彎流，狀似昂揚象鼻。壺蓋以貼花蓮瓣紋環繞，上置上斂下豐立鈕，壺鈕中間略往內收。德國安東烏爾里希公爵博物館 (Herzog Anton

Ulrich Museum) 收藏安東烏爾里希公爵 (Anton Ulrich, 1633-1714) 及其妻子伊麗莎白茱莉安 (Elisabeth Juliane, 1634-1704) 舊藏五十件紫砂器。(註九)其中〈紫砂貼花牡丹紋象耳提梁壺〉(圖十六)提梁造型及壺頸裝飾一周特徵，與〈紫砂象耳提梁壺〉一致。或可推測，後者年代應為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，而非晚迄乾隆時期。

做為官窯器形來源的紫砂器

就雍正朝《活計檔》而言，頻繁地出現以紫砂器做為其他質材模做的對象，其中又以瓷器最為常見。儘管乾隆朝亦見類

及紋樣，見於同為 Hatcher 於一九八五年打撈上岸 Geldermalsen 號 (圖十)。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可知，後者沉沒於乾隆十七年 (一七五二)，也就是比「的惺號」早了約七〇年。也就是說，儘管清宮傳世

〈紫砂平蓋碩腹壺〉與「的惺號」所見略似，仍無法就此援引後者，做為前者年代的參考依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九三四年張虹、李景康編《陽羨砂壺圖攷》遺器「明月一天涼



圖10 清 18~19世紀 青花水波龍紋盤 Teek Seeun號 引自前引Nagel Auctions: Tek Sing Treasures, p. 206.



圖9 清 乾隆 青花水波龍紋盤 Geldermalsen號 引自The Nanking Cargo, Christie's Amsterdam, 1986, pl. 3229.



圖11 清 19世紀 紫砂碩腹壺 引自《宜興陶器圖譜》，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82，頁2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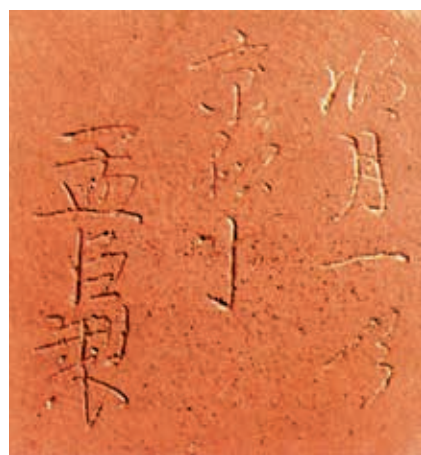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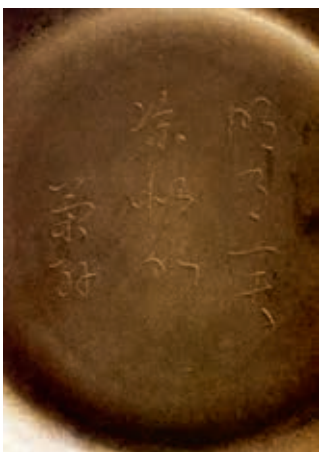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2 清 19世紀 「明月一天涼似水」款識 Teek Seeun號 引自前引Nagel Auctions: Tek Sing Treasures, p. 67.

似水」款〈紫砂碩腹壺〉(圖十一)，造型與清宮傳世所見頗為相像。據其刻款風格，推測為嘉慶(一七九六~一八二〇)、道光(一八二一~一八五〇)時期之作。因此，筆者傾向清宮傳世〈紫砂平蓋碩腹壺〉年代下限，或晚迄十九世紀。事實上，「明月一天涼似水」款識內容及布局方式，亦見於「的惺號」船貨。(圖十二)

就與本文相關作品而言，清宮傳世以往被視為雍正朝的紫砂器，尚包含如蓋面刻寫「六安」、「珠蘭」等茶葉名(紫砂泥繪蘆雁圖茶葉罐)。(圖十三)作品呈弧肩，肩以下弧度做內收造型，罐蓋微鼓，蓋身中間略往內收。王光堯依據乾隆朝《活計檔》，指出茶葉名為乾隆皇帝要求造辦處所刻。(註七)趙聰月進而推測此類茶葉罐，應製作於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

紫砂壺，然而是否如前引雍正朝《活計檔》所述仿自紫砂壺，抑或其他質材同類壺式，已不得而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〈紫砂貼花梅紋殘壺〉一類製品運抵荷蘭，德爾夫特 (Delft) 陶工 Ary de Wilde (一六三六—一七〇八) 應會以其做為模仿對象，製作〈貼花梅紋鈕壺〉(圖二二) 一類作品。鉢壁書寫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、鉢蓋陰刻壽字以五蝠環繞(紫砂心經蓋鉢)(圖二三)，造型呈斂口、深腹，圓底無足。根據雍正十一年(一七三三)《活計檔》：「二十一日司庫常保首領太監薩木哈持來



圖19 清 雍正 粉青釉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《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》卷一下冊，北京：故宮博物院，2005，圖202。



圖20 清 雍正 瓷胎畫琺瑯節報喜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8 清 紫砂圓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《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》，圖1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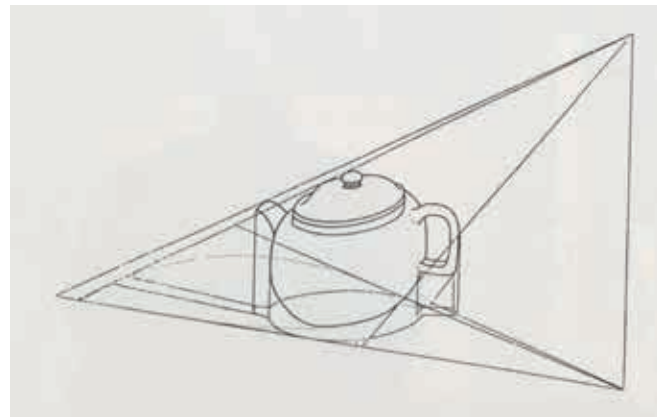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7 清 雍正 壺式插圖 引自《視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雍正刻本影印，1995。

似記載，較之前朝仍屬少數。綜觀雍正朝《活計檔》，可以確知紫砂器至少包括壺、鉢等器類，曾為其他質材所借鑑，試擇要敘述如下。

雍正四年(一七二六)《活計檔》：「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：宜興壺大小六把。奉旨：此款式甚好，照此款式打造銀壺幾把，法瑯壺幾把，其柿形壺的靶子做圓些，嘴子放長，欽此。」(雍正四年，法瑯作(大器作)，十月十日條)雍正七年(一七二九)《活計檔》：「圓明園來帖內稱，閏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素宜興壺一件。奉旨：此壺把子大些，嘴子亦小，着做木樣改准交年希堯燒造。」(雍正七年，記事錄，八月初七日條)可以窺知宜興地區生產的紫砂壺，與銀壺、瓷壺的親緣關係；雍正元年(一七二三)《活計檔》：「十五日摠管太監張起麟、茶房首領太監明自忠、李英、呂興朝全持出交：平面桌一張(宜興壺三把、小磁缸一件、腰形紫檀木茶盤一件、青花白地磁鐘兩件)。」(雍正元年，法瑯作(附大器作、鍍金作)，十月十五日條)雍正十年(一七三二)二月初一日「賞茶鶴立、達爾吉、班第：每人宜興壺一把、磁茶鍾二個。」(雍正十年正月立實用底簿)也就是說，紫砂壺不僅為

其他質材所仿，亦曾為宮廷所用，甚至用於下賜、賞用。

目前已難得知，上述所謂「宜興壺」確切樣貌，不過學者曾因年希堯(？)(一七三九)翻譯《視學》所錄插圖(圖十七)造型與〈紫砂圓壺〉(圖十八)相像，以為後者屬雍正朝之作，並指出該圖為年希堯據皇帝旨意，利用西方透視學原理改進官造茶壺的樣式。(註十)不過，《視學》所錄插圖，實為年希堯翻譯該書時期望能清楚的解釋，才將雍正官窯瓷器與西方原著插圖調換。書中所錄壺式，則為說明如何求得物體影子的有趣案例。其壺把近底折收特徵，與「大清雍正年製」款粉青釉壺(圖十九)異曲同工(註十二)，然而目前並無與插圖造型一致紫砂、瓷壺實物傳世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器底以藍料書寫「雍正年製」雙方框宋體字款(瓷胎畫琺瑯節報喜茶壺)(圖二十)，肩部圓錐，肩以下內收弧線和緩。壺蓋沿略大於壺口，鈕頸細長，頸側設氣孔，壺鈕寬扁。前引康熙三十六年(一六九七)Oosterland號〈紫砂貼花梅紋殘壺〉(圖二一)，其圓肩、器身收斂弧度與壺把造型，即與〈瓷胎畫琺瑯節報喜茶壺〉相似。後者原型或源於



圖23 清 雍正 紫砂心經蓋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—紫砂器》，圖146。

《活計檔》雖提供詳實的成做記錄，然而多數檔案所載品名，至今無法與傳世實物逐一比對。此亦即當今學者在研究相關課題時，所可能遭遇到的另一困境。筆者藉由手邊令人汗顏的資料，在學者們的基礎

小結

相對於傳世數量龐大的紫砂器，據考古正式發掘報導者數量極少，儘管鑑賞界對於紫砂器的類型與變遷，有其一定認識及理解，然而絕大多數仍難有效予以檢證。

宜興鉢一件。奉旨：著宜興鉢樣式，另尋宜興鉢一件交與燒造磁器處，做樣將均窯、官窯、霽青、霽紅鉢各燒造些送來，其均窯的要緊，欽此。」（雍正十一年，記事錄，二月二十一日條）明確地要求，以「宜興鉢」做為御窯廠仿燒的對象。學者已指出所謂的「宜興鉢」，即〈紫砂心經蓋鉢〉一類製品，仿自紫砂蓋鉢的瓷器，則見於北京故宮收藏。（註十二）應予留意的是，〈紫砂心經蓋鉢〉心經文末，陰刻書寫「拈花寺」銘。乾隆朝《內務府奏銷檔》：「萬壽寺、拈花寺、柏林寺、覺生寺、法海寺、廣通寺等六寺廟俱係常住地方，向無粘補修理之例。於雍正年間，奉特旨敕建重修，且每月官給養贍銀兩。」（註十三）可知萬壽寺、柏林寺、覺生寺、法海寺、廣通寺，以及前述拈花寺，曾於雍正時期進行修整。《世宗御製拈花寺碑文》載：「京師內城西北隅有護國報恩千佛寺者，創自前明，歷百有六十載。琳宮頹蔽，鐘鼓寂寥。爰命重加修整，經始於雍正十一年正月，本年九月告成。梵宮禪宇，煥儼輝煌，堪為大眾熏修參學之所。因擇瑋國師下法嗣名超善者，命主方丈，錫寺額曰拈花，揭之山門。」（《欽定四庫全書》，卷五四）可知拈

花寺原名千佛寺，創建於明朝，雍正十一年（一七三三）進行修整，於同年九月完工。

不僅如此，傳世可見與〈紫砂心經蓋鉢〉同類造型、留有「覺生寺」款紫砂心經鉢。根據殿前〈雍正御製文碑〉：「京師西直門外曾家莊有圓址爽塏，長林佳茂，此地右隔城市之囂，左繞山川之勝，宜為寂靜清修之地，用是肇建梵宇。經始於雍正十一年正月，告成於十二年冬，爰賜名覺生寺。」（《欽定四庫全書》，卷九九）說明覺生寺選址依據，以及始建完工之時。

搭配雍正皇帝旨，以「宜興鉢」做為其他質材仿燒樣本的時間，即與拈花寺修繕、覺生寺敕建同年。雍正十一年《活計檔》：「十二月二十二日做得法瑯鉢一件，隨匙、布等全，首領太監薩木哈持去交太監滄州呈進訖。隨傳旨：嗣後不必再燒造，欽此。」（雍正十一年，法瑯作，正月二十一日條）指出停燒該類鉢式的時間，即在修繕佛寺竣工之前。也許，紫砂心經蓋鉢、同類鉢式其他質材製品，有可能為前述雍正時期修整之漢傳佛寺所用。

上，粗略地排比以往被視為雍正朝的紫砂器，旨在提示部分作品的定年，或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。應予留意的是，同類器式的差異性，並非意謂來自不同時代，也可能只是相異陶工作坊針對某一時尚器式，

個別做出的詮釋創作。因此，關於清宮傳世紫砂器的個別年代，無疑有待日後結合其他作品的考察，再予評估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

圖22 荷蘭 17世紀 貼花梅紋獅鈕壺 香港茶具文物館藏 引自《宜興陶藝》，香港：香港市政局，1990，圖111。



圖21 清 康熙 紫砂貼花梅紋殘壺 Oosterland號 引自註3，fig. 5.

- 註釋
1. 本文為筆者於二〇一五年八月完成之碩士論文《清宮傳世紫砂壺及相關問題》第三章第一節部分內容。論文寫作期間，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終生講座謝明良教授悉心指導。本文完稿後，又蒙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余佩瑾處長給予建議，裨補闕漏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 2. 王健華，〈故宮舊藏雍正紫砂器的斷代分析〉，《二〇〇七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〇九，頁二九五—三〇四。同氏後於多篇論文沿續此一觀點，見〈故宮舊藏雍正紫砂器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期，二〇〇八，頁二〇—二七；〈甄別故宮舊藏中雍正紫砂器的四點依據〉，《紫泥沉香：二〇一五宜興紫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南京：譯林出版社，二〇一七，頁一四四—一五五；〈故宮舊藏清代雍正朝宮廷紫砂器〉，《紫泥匠心——宜興市博物館「故宮紫砂回鄉展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（初稿）》，故宮博物院等，二〇一七，頁一六〇—一七三。另外，高曉然於二〇〇七年國際紫砂研討會，亦結合《活計檔》及雍正皇帝審美趣味，梳理一批所謂雍正朝的紫砂器，見〈故宮舊藏雍正朝紫砂器與同期瓷器的相互影響〉，前引《二〇〇七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二〇七—二一〇。
 3. Jane Klose, "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: the Oosterland [1697], Bannebroek [1713] and Braderode [1785]",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, vol. 64 (1999-2000), pp. 67-70.
 4. 王文徑，〈清藍國威墓和陳鳴遠製紫砂壺〉，《東南文化》第三期，一九九一，頁二七—二九。
 5. 黃健亮，〈淺談朱泥壺的斷代標準——隱藏在朱泥標準器款識中的時代訊息〉，《荊溪朱泥：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》，臺北：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，二〇一〇，頁二四。
 6. 陳國棟，〈關於所謂「的惺號」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見〉，《水下考古學研究》第二卷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二〇一六，頁二—四四。承蒙王淑津女士惠贈資料，謹此致謝。
 7. 王光堯，〈清代前期宮廷紫砂器呈現的文化趨向〉，《紫砂意象：紫砂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浙江：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，二〇一—，頁五八—五九。
 8. 趙聰月，〈清宮檔案與清宮舊藏紫砂器〉，前引《紫泥沉香：二〇一五宜興紫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一六九。
 9. Eva Strober, 〈歐洲的宜興紫砂器〉，《紫玉暗香——二〇〇八·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》，南京：江蘇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，頁一五一。
 10. 王健華，前引〈故宮舊藏雍正紫砂器的斷代分析〉，頁三〇—三〇。
 11. 此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余佩瑾處長提示，謹致謝意。
 12. 王健華，前引〈故宮舊藏雍正紫砂器的斷代分析〉，頁三〇。
 13. 《內務府奏銷檔》，冊二〇二，轉引自賴惠敏等，〈雍正與北京漢傳佛寺〉，《兩岸故宮第一屆學術研討會：為君難——雍正其人其事——及其時代論文集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一〇，頁一七八。另外，本文引自《欽定四庫全書》內容，亦源於此文，特此說明。